

榜样人物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的辩证逻辑论析

程立涛, 刘佳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 榜样人物或道德楷模是社会生活中道德品质最高尚、最完美的典范。在中华传统道德和社会文明接续递进、嬗变转折的历史进程中, 无数榜样人物或道德楷模如同一颗颗晶莹闪亮的珍珠, 构成华夏民族历史长河中的“纽结”。以榜样人物为示范将抽象的道德理念、道德精神转换为鲜活的道德形象、道德生活, 以此为契机实施道德教育、传承优秀道德文化精髓、整合道德秩序、引领道德进步, 这是中华传统德治文化的独特优势和优良品性。榜样人物的传承汇集“历史”与“当下”、“普遍”与“特殊”、“理想”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等矛盾于一体, 从微观视角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传承实践的动人景观, 完美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脉络, 它对于推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 榜样人物; 道德先进性; 道德超越性; 道德创造性

doi: 10. 3969/j. issn. 1673-9477. 2025. 01. 008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5)01-0060-06

榜样人物或道德楷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接续递进、嬗变转折历程中一条鲜明主线。榜样人物不仅是引领社会文明进步的风向标, 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杰出典范。在中华民族长久的德治传统与国家治理实践中, 榜样人物将抽象道德理念(原则、规范、精神等)转化为具体生动的鲜活形象, 以典型活动、典型事件、典型事迹为实践载体,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精髓, 强化道德理念和道德精神的感染性、可接受性和吸引力, 激励大众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持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从微观视角诠释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文化进步的动人景观。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演化轨迹及内在规律, 能够从榜样人物的传承实践中获得丰富的实践启迪和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历史”与“当下”相遇: 榜样传承的道德示范性

在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上, 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不惧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 始终心怀梦想、不畏艰难、勇于探索和追求, 依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世代繁衍生息。从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神话传说, 到大禹治水、神农尝草、愚公移山等

历史典故, 五千年的道德文明以无数榜样人物及其模范事迹的积淀而令人倍感亲切, 在人们内心深处镌刻下悠远而绵长的道德回忆。榜样人物以道德人格化的形式呈现并“活化”传统, 以自身对道德善的正确理解和自觉践履, 无形中引领大众强化道德修养, 砥砺道德品质, 升华道德境界, 坚守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所谓传统, 并不是一种死的东西, 而是通过一定的载体流传至今并继续在令人身上发生影响的东西。”^{[1]68} 榜样是经受历史反复淬砺、鲜明凸显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 它所承载的不是泛泛的传统道德, 而是经过历史不断凝练而成的道德文化精华, 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生而为中国人, 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 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2] 中华优秀道德传统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也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核心价值坐标。

榜样人物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 既是过去的又是当下的, 榜样传承优秀道德文化必定带有鲜明的道德二重性和示范性品质。首先, 榜样是特定时代和历史条件的产物, 自身所凝聚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精华, 代表着特定历史时期道德发展的最高峰。例如, 无论是忧国忧民的屈原、顾炎武, 还是以身殉国的岳飞、文天祥, 以及血战日舰、殉难黄海的

[投稿日期] 2024-0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 19AKS011)

[作者简介] 程立涛(1964—), 男, 河北藁城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

邓世昌、林永生,都是中华民族崇高爱国主义精神的化身,这些彪炳史册的爱国者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最高追求,以宁死不屈、抗暴御侮的英雄气概谱写着一曲曲催人奋进的爱国主义豪迈壮歌,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英雄行为转化为人民群众和衷共济、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其次,每个榜样又是具象化的、活生生的、现实的存在,与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和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价值取向,因而榜样始终是“活在当下”的传统。追求和平正义是中华优秀道德传统,然而,作为道德范畴的正义很难为大众所目睹,为此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作者巧妙地采取艺术化的处理方式,激活榜样人物在“当下”的逼真形象。例如,北宋名臣包拯以嫉恶如仇、除暴安良、匡扶正义而闻名,以其“正义的化身”形象而深受百姓爱戴。在阅读史书或观赏影视剧时,人们感受到的不再是传说中的包拯,而是活在身边的、清正廉洁、铁面无私的行政执法人员,这样的形象满足了大众对完美正义、不断上进的现实诉求。以榜样为化身的道德能够有效融入大众生活,外化为个人的道德抉择和行为指南,正是在于它秉承优秀道德基因且以榜样“活化”为载体,依照“当下”的道德实践对传统道德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在当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榜样人物所负载的历史性向度,意味着自身已充分意识到并自觉承担起传承优秀道德传统的神圣使命,“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3]。作为道德理想化身的榜样凝聚着悠久的华夏文明,内蕴一脉相承的道德精神和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理想。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和巨大的历史使命感,推动他们结合新的社会实践和时代诉求,对传统道德进行审慎思考和辩证扬弃,继承其科学性、民主性和人民性的思想精华,并以全新的方式阐释和践行道德传统,从而为榜样的现实性向度拓展了广阔空间。宋代理学家程颐曾将孟子的“修身”与“养性”相结合,创造了“修养”一词,作为涵养品行、陶冶情操的主观努力和社会实践。刘少奇在撰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系统总结并吸收了中国古代修养论的合理内涵,创造性地提出共产党员加强修养的重要性。他说:“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4]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无私无畏、正气凛然是在党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道德楷模的优秀品质。因

为这里的修养不再是传统文化中的“反求诸己”“束身寡过”,或者纯粹意义上的个人私德的完善与提升,而是以革命斗争实践为基础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通过勤奋学习、涵养锻炼、艰苦创业而达到的崇高能力或思想品质。道德楷模的示范和引领使传统道德注入新的活力并获得特殊的传承效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成长起来的道德楷模,不仅承载并有效传播传统道德精华,而且启迪着未来新道德的萌生与成长。这种“历史”与“当下”的相遇和衔接,借助榜样的力量不断转换、持续延伸,体现着“历史”与“当下”的彼此激发、有机统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以“普遍”与“特殊”相交融的方式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普遍”与“特殊”融合:榜样传承的道德实践性

有学者指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的生命力如何,适用性如何,就是看其有多大的适用性;其越具有普遍性,越能推而广之,就越具有至上性。”^{[1]65}中华传统道德以内在蕴含普遍意义的道德精神而著称于世,集中表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德不孤,必有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等无数熠熠闪光的道德精华。无论社会条件怎样,时代如何变迁,其蕴含的道德理念都有着永不褪色的恒久价值。在时代更迭中接续递进的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正是因其普遍性而拥有穿越时空的生命力。不同时代的榜样人物所传承的正是这种恒久的道德精神。唯物史观认为,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道德观念,归根到底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和表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没有共同性,因而在道德观念上不存在共同之处,恰恰相反,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5]自古以来,尽管中华民族经历过剧烈的王朝更迭和民族之间的纷争与融合,但始终没能改变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历史大趋势。“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及其一贯思想,就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1]238}先人后己、助人为乐,敬业乐群、献身社会,这种整体主义思想是中华传统道德区别于西方伦理道德的显著特点和突出优势,也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生生不息、恒久传承的内在动因。以整体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普遍性使得中华传统

道德获得了超越性、至上性,不因时代和实践的变迁而有损其精神,相反在历史长河的淘洗和磨砺中愈益显示其光华。

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遍性意义并不排斥其特殊性。因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或思想的一般意义、抽象意义的延伸,总是通过其具体的、特殊意义的提出、充实、改变和流传而实现的”^{[1]65}。普遍性的现实根基和生命活力恰恰在于其特殊性,突出表征为特定的人类群体榜样和个体榜样,或典型的历史活动以及重大事件等。中华传统社会强调德教为治国之本,刻苦求学、尊师重道的优良德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史书中记载的此类典范故事不胜枚举,如车胤囊萤、匡衡凿壁、苏秦刺股、程门立雪等。在历代统治阶级实施道德教化过程中,大凡致力于劝学修身、尊师重道的文化实践,常常以榜样示范的形式(如车胤、匡衡、苏秦等案例)激励读书人排除万难,刻苦攻读,立志成才,报效国家。每当读书人产生懈怠心理和畏难情绪时,也常常以这些榜样人物反躬自省、激励和鼓舞自己的斗志。此时,车胤、匡衡、苏秦等早已不再是个别的励志学习的案例,而是升华为中华民族始终如一地努力进取、不懈奋斗精神的文化象征。在长久的历史演进中,榜样人物铸就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有的典范思维和行为实践。例如,每当人们论及忧患意识自然会联想到范仲淹,秉承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会提及顾炎武。这种榜样示范所铸就的道德思维模式,蕴含着矛盾普遍与特殊的内在融合与有机统一。榜样人物中的每个特殊案例都是普遍存在的寓所,因而普遍注定离不开特殊。在特定条件下特殊之所以能转化为普遍,成为特定时期社会大众的“共同道德意识”,乃是因为特殊本身就包含着普遍。范仲淹的忧患意识和顾炎武的爱国主义情怀,不仅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现代转换,而且激发并引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传统跃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榜样示范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的现实拓展,实现着由特殊转向普遍、再由普遍走向特殊的双向转化。

普遍与特殊融合与统一的根基在于以榜样为化身的道德实践。榜样人物是特定时代道德实践的卓越主体,也是社会公共精神的彰显者和代表者。1963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全社会各单位、各部门积极响应,在全国范围掀起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的热潮。经过60多年的深化拓展,如今中华大地上学雷锋运动蓬勃发展,成效显著。从覆盖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社区、医院等基层单位

的学雷锋示范点、岗位学雷锋标兵的评选,到新时代雷锋精神向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的延伸;从“百姓雷锋”的凡人善举到“邻居互助”的志愿服务,以及在重大活动、扶贫救灾、敬老救孤、法律援助、文化支教、环境保护乃至健康指导等活动中,人们在不同岗位上书写着雷锋故事的崭新篇章,将雷锋精神转化为公民个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推进学雷锋志愿服务常态化和制度化,培育“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气。中华大地上有千千万万个雷锋在行动,他们是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化身和呈现,学雷锋和志愿服务成为公民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途径。雷锋的模范事迹从道德特殊上升到道德普遍,是一种道德理论上的创造与升华;同样,由普遍的道德精神转化为群众性的学雷锋志愿活动,即普遍的道德精神转化为具体的实践、特殊的活动,则是更高意义上的、超越性的道德创造和道德实践。无论传统道德的创造转化还是创新发展,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道德主体,离不开人民群众对美好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创造新生活的实践。

三、“理想”与“现实”互动:榜样传承的道德超越性

历史上,榜样人物大多以理想人格的形式呈现。重视理想人格的积极建构,努力发挥理想人格的教育、激发和引领功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特色。在儒家文化中,孔子推崇“智仁勇”三者合一的理想人格,^{[6]315}其中,智、仁、勇分别代表智慧、道德和勇气。孟子以奉行正义、威武不屈的“大丈夫”为理想人格,其典型特征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强调理想人格应具有“圣贤气象”,认为执着于善的追求和远大目标,具有圣贤般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才是理想人格的最突出特征和完美表征。道家则认为与自然合一的“真人”才是理想人格。诸多不同类型的理想人格类型,各具特色而又深深扎根于生活之中。延续儒家理想人格的精神气质。黄宗羲、颜元倡导“豪杰”“大丈夫”般的理想人格;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梁启超提出“新民”的理想人格类型。历史上的榜样之所以被称作理想人格,是因为他们往往以人格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唯有如此,才能承载穿越时空的中华道德精神,契合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条件的客观诉求,以榜样示范的方式为大众所理解、记忆和仿效。大众在进行人生规划与未来设计时,循着符号化的理想人格为价值准则,引领自己的目标选择和理想追求。榜样或理想人格的突出特征是理想

性或超越性,它是指向未来的完美道德境界。其中既有对自身(和社会)道德不完善的确认,也包括对未来完美道德理想的向往。由于传统道德对理想人格的设计偏重主观色彩,忽视其存在的现实生活根基,因而没能找到通往现实的正确道路。那种仅仅依靠脱离社会土壤的自我修养,既不能真正实现个人德性完善,也不能达到改造不合理制度的目的。

实际上,无论何种榜样或理想人格都来自生活,与特定时代和历史条件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理想源自现实而又超越现实,榜样或理想人格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即理想连接着现实。另一方面,理想之所以不会沦为空想、幻想,就在于它又要复归于现实,成为新的、更完美的现实。一定社会的道德理想与人们实际的道德状况之间的矛盾,构成道德发展的基本矛盾,榜样或理想人格以文化传承的方式致力于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解决。他们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越深刻、越准确,践行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自觉性就越高,追求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信念就越坚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深深植根于现实的中国大地上,经过长期不懈的革命斗争和实践探索,终于找到解决中国社会“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选树的道德榜样,其优秀性和独特性在于,始终坚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将远大理想与现实担当融为一体,“把远大的道德理想与个人切身的道德处境紧密结合起来,脚踏实地地在道德境界的阶梯上不断攀登。”^{[6]316}在李大钊看来,要把理想的社会制度变为现实,必须发扬革命的斗争精神,积极从事国民教育和对大众的正确引导,才能真正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李大钊把这种新的生活态度和人格理想称为‘青春’进取,他认为广大民众只要有了自我觉悟,发扬这种青春朝气,改造自身之衰弱性和颓废性,就能完成振国兴邦的使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7]41}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文化改造创新的基础上,新时期的道德楷模有效弥补了传统理想人格知行分裂的缺憾,在进行伟大斗争的实践中将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有机统一起来。

根据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需要,科学选树并及时推出道德楷模、英雄模范、先进人物、身边好人等,充分发挥榜样人物的价值示范和引领功能,不断提升全体人民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是党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高度赞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精辟阐述了革命队伍中道德楷模的高贵品质。他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8]60}榜样人物所体现的道德的理想性、超越性,为大众展示出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前景。共产主义理想的蓝图一旦落实到实践中,就能够转化为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对传统道德进行改造和提升,创造出崭新的道德面貌和社会风尚。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出无数具有时代特色的道德典范,他们传播并实践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升和扩大了新的思想道德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学雷锋、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号召,对开展群众性思想道德建设活动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增强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信心与力量。全国各地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竞赛热潮。中华大地上人际和谐、经济发展、思想更新、道德进步,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7]21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时代楷模”的道德传承实践折射出理想与现实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运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推动道德生活新秩序的创新与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

四、“继承”与“创新”衔接:榜样传承的道德创造性

创造或创新不是对传统的悖逆,而是对传统的澄清、完善和拓展。从道德传承的规律看,“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5]540}。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文化,在其长久的历史演进、变迁中,既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又有发展性与变动性。对大众来说,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往往是不自知地潜移默化进行的,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世的态度、立身行己的准则等生活细节。那些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的精髓“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里去想,就不会懂得”^[9]。榜样人物或理想人格能够深刻感悟传统道德精髓的深厚意蕴,他们不仅高度自觉地接受传统道德文化精华,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地传承中华优秀道德精华,积极推动传统道德文化薪火相传,并结合历史和时代

发展的客观需要以自身的模范行为不断增添新内涵,努力在新的实践中展示新作为、作出新贡献。自古以来,孟子“大丈夫”的理想人格曾激励无数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坚定不移地奉行正义,始终不渝地坚守大道。文天祥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过:“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10] 闻一多和朱自清不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舍生取义,始终坚守高洁的人格和民族尊严,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底气、骨气和志气。从文天祥、于谦、朱自清、闻一多等道德榜样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道德创新的有机统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与历史上任何性质的爱国主义相比,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有着全新的内涵、特质与历史意义,它是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主义运动。它是在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生的重大事件,主体是青年学生、工人阶级和其他广大爱国者,他们喊出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最强音,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五四时期的爱国者身上,人们丝毫看不到旧时代的烙印或影子,这一时期的爱国思想是以新的历史条件为背景,将爱国主义传统深入转化和积极吸收,并与新的社会环境相结合的升华与创新。“这种爱国主义作为一面伟大的旗帜,指引着中国的革命阶级和人民大众从爱国主义直接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并一步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道路。五四以来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由此成为中国现代的仁人志士所必备的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道德品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道德建设,始终将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作为最重要、最基础的内容。”^[7]¹⁴⁻¹⁵ 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爱国者对传统道德精髓的巧妙过滤和精心吸纳,才能够锻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爱国者。在他们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满怀一腔热血的爱国志士,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鲜明主题,“要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不懈追求,着力扎紧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引导人们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

神动力”^[11]。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坚定弘扬者。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⁵³³⁻⁵³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则和道德规范是连续性和变动性的矛盾统一。这种统一指向双重维度,首先是指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彰显中华道德传统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道德现象,归根结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其次是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形成新时代对道德诉求的积极回应。“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或向往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不仅必须把继承这些优良传统作为充实和发展自己道德品质的营养剂,而且还要把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些优良的道德看作自己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12] 在紧密结合历史和时代诉求中推进创新实践,成为新时代榜样人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特色。2018年12月,中宣部授予黄大发“时代楷模”称号。在担任贵州省遵义市团结村党支部书记的36年里,黄大发带领两百多名群众,硬是靠着力锤、钢钎和双手,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九千多米长的生命渠,以实际行动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矢志不渝地践行愚公移山、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当代活愚公”。以黄大发、毛秉华、南仁东、袁隆平、张桂梅为代表的我国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分子和“时代楷模”,努力承载并实践热爱祖国、勤劳勇敢、团结友爱、谦虚礼貌、诚信友爱、人民至上、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等传统道德精髓,并结合自身实践中不断增添富于生命活力的新内涵,铸就了以科学精神、奉献精神、劳模精神为代表的中华民族道德精神谱系,在强大的塑造动能与创新实践中推动中华现代文明迈向新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 [1] 瞿振元,夏伟东. 中国传统道德讲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71.
-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 [4]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1-102.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简编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 [7]夏伟东.中国共产党思想道德建设史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 [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7.
-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95.
- [1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12.
- [12]周原冰,共产主义道德通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25.

[责任编辑 李瑞萍]

A Dialectical Logic Analysis of Role Models Inheriting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Morality

CHENG Litao, LIU Jia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bstract: Role models or moral models are the noblest and most perfect examples of moral quality in social lif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social civilization, countless role models or moral models are like glittering pearls, forming a “kno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 It is the unique advantage and fine tradition of Chinese rule of virtue culture to transform abstract moral ideas and moral spirit into vivid moral images by taking examples as models, so as to inherit the essence of excellent moral culture, integrate social moral order and lead the progress of moral life. Model inheritance integrates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universality” and “distinctiveness”, “ideal” and “the realit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showing the moving landscap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moral inheritance practice from a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and perfectly interpreting the context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orality,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role models; moral advancement; moral transcendence; moral creativity